

大 專 用 書

中國教育史

胡 美 琦

三民書局印行

中國教育史

胡美琦 著

學經歷：師範學院教育系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育研究院研究

三民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再版

◎ 中國教育史

基本定價伍元伍角陸分

作者 胡美琦

行人 劉振強

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業字第二〇〇號
著作權執照內著

自序

猶憶民國三十七年，我初入國立廈門大學攻讀教育系，曾讀到陶知行先生所著記載他創辦曉莊學校一書，當時深受感動，尤以書中所述有關如何陶冶學生心性者，更覺傾心。私下立志，將來畢業後，亦必辦一如曉莊學校般富有教育理想的學校為終身職業。事隔三十年，至今陶書確名早已忘，書中所述詳情亦已無從追憶，然使我深刻難忘的，則是這本書在當時曾啓發了我對於教育心理學的愛好，並知凡從事教育工作者，所應抱有之理想。

我在厦大僅讀了一年級，只讀的普通課程，尚未讀到教育心理學。三十八年，大陸沉淪，逃到香港，曾轉入新亞書院寄讀。所選課程中有教育心理學一門，却使我很失望，因所講心理學並非如我所想像。但我當時亦並不能明白說出自己所喜歡的心理學究竟是那樣的，只覺得自己心中有許多疑問無從獲得解答。但同時讀到中國文化史一課，在那國家整個沉淪時，這門課却使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重又燃起了信心，而連帶對自己的未來亦充滿樂觀。

限於當時的環境，我只在新亞讀了一年，又轉來臺灣，進入當時的省立師範學院即今國立師範大學之教育系，借讀兩年直到畢業。在師範學院的兩年中，所讀全部課程盡是有關教育的，使我逐漸感到越讀教育專門的課程，與我當年初進厦大時所抱對於從事教育事業需有理想的一番心情及對教育心理的愛好距離却越遠，內心不免常感到空疏。而當年得自中國文化史一課的印象，則不時常在腦海中流轉，於是自己選定王陽明的教育思想為題，作為我私下研究的工作，成陽明教育思想一小書。當時於陽明傳習

錄中讀到許多有關教學故事的記載，啓發了我對儒家心性之學的愛好，重新又引起我對研究教育心理的興趣。但欲從王學入門，再作深入的研究，必得通理學，以自己當時對國學知識的過於淺薄，一時實無從着手，只得暫時擱置一旁。那時我實亦未能深切體認到儒家心性學與西方教育心理學之異同，更不知儒家心性學在今日新式教育制度下所可有的地位。

民國四十五年春在港成婚，因向學之心甚切，乃於四十七年春赴美，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教育研究院進修一年，我又重新燃起要探究西方教育心理學的願望，因此選了教育心理學一課。據當時同班美國同學告訴我，教心理學的這位教授是美國當時頗負名望的心理學教授之一。但這門功課給我的印象，雖限於語言的困難，上課時我無法領略教授許多風趣幽默的比喻外，而其課程內容，除了增添許多新的教育心理學的實驗資料外，與我十年前在香港時所唸大致相同，只所用語言文字相異而已。自美回港後，我對西方教育心理學再無興趣，而於我國原有的儒家心性學則更深懷念，惟因當時生活極不安定，未能一意全心向學，僅能不斷作偶然之翻閱而已。

民國五十六年，由港遷臺，定居外雙溪，生活安定。心情輕鬆，於是又引起我對儒家心性學探討的興趣。逐漸深切體會到，不明白中國整個學術思想史的演變，實在無法對儒家有關人生教育方面的心性問題有真切之瞭解，於是始決心再加擴大我的研究範圍到中國全部教育史的題目上來，而於教育史中特注重及學術思想之演變。外子賓四於五十八年起在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開課，每年所開課目雖不同，然多屬有關中國學術思想方面。外子晚年講學，頗喜注重在學術思想自古至今的演變，並喜針對當前中西雙方現實世界中之種種弊病而有所剖析，對我啓發最多。

民國六十年冬，蒙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曉峯先生許我在文化學院歷史系開中國教育史一課，每星

期兩小時，六十二年又增開中國通史一課。教育史一課初開時，曾草擬一大綱，於每星期上課回家後，必將堂上所講，以及講課時連帶牽涉到的問題與自己所省悟的種種感想，於散步中向外子一一詳告。有的經他再深入講解，有的命我再查書補充，數年來未曾中斷。我最先所擬大綱遂有不斷修正與增添，而中國通史的講授對我教育史一課的教學亦極有裨益。

六十五年夏，我乃特地辭去中國通史一課，以便專心一志將講授中國教育史一課累年所積的卡片全部整理成書。此一工作由正式動筆至完成，前後近兩年。初稿陸續完成時，外子曾隨時加以潤飾。他本允待我全稿完成後，再從頭至尾爲我修飾一遍。不幸，他於去年冬雙目視力驟然衰退，不能見字。稿成，我只得將全書向他誦讀一遍，他在聽後又隨時口加修飾。

自念我決心研究中國教育史，已年過四十，苦於國學基礎太過薄弱，此一工作深有力不從心之憾。本書疏漏之處，自所難免，容他年學業有進，於將來此書再版時，當續加修正補充。本書所取材料太多，未能一一註明出處，特於每一篇後附參考書目，書中所引未查原書者，則參考書目中亦不列入。

此書之成，實有賴於張曉峯先生之慨然許我在中國文化學院開課。又文化學院許研究所年老教授可各自在家開班，不必一定要到校。外子之課如不在家中講授，此九年來，我亦難以每次參加聽講，則此書之成，恐仍有待。這一切皆得感謝張曉峯先生，特在此著誠懇之表白。

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胡美琦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書成自序

引 論

一

中國傳統文化極重視歷史，歷史包括了一切人事記載，並不專限在政治、軍事、經濟等事項上，而尤所重要的，則爲人物一項。中國人奉爲正史的所謂二十五史，開始於史記，即爲一種列傳體，此即說明人物記載乃是中國歷史之主要主幹。其在政治、軍事、經濟等種種項目上撞了禍，貽害人羣的，當然歷史上不能不記載，以供後人之炯戒，但歷史人物主要注重正面性的，可資後人師法的。因此，以人物爲中心的中國史，也可說是一部教育史。而在中國歷史上，若分門別類來看，反而像教育一門轉形冷淡。若寫分門別類的中國教育史，反而會感到材料不多，這裏面卻有一番特別的情由，需該說明。

再從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觀念看，人類文化的演進主要在乎人類自身的教化。一個民族文化價值之高下，與其歷史過程事屬一體。有關人事的一切都密切相關，全包涵在人文一體中，但一民族傳統文化對此各方面發展之偏重偏輕，影響所及，實是決定此一民族的文化價值與其前途及命運。

中國歷史其對一切文化事態似乎特別重視學術思想之具有教化功能者，其地位又在其他政治社會一切事變之上。以中國人觀念來說，也可謂應以學術思想來領導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換言之，即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都應在民族自身教化一大理想大前提之下。此一觀念實使我中華文化在以往歷史上能屢仆屢起，雖國家屢經禍亂而文化終能綿延不斷，並成爲世界上文化最悠久、歷史最完備的國家。

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傳統最看重教育。但所看重的是廣義的教育，而不是狹義的僅指傳授智識技能的學校教育而言。所謂廣義的教育，乃是指人生的全部過程，自幼兒以至老死，以及人生的各種活動，包括家庭與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一切交往在內。因此，中國自古以來歷史上並無單純的所謂教育家，也缺乏專門講教育理論的書籍。其實我們可以說，一部中國思想史即是一部中國教育思想史，凡是歷史上被社會所尊重的人物，他都帶有教育家的精神，因為他足以爲當世法，足以爲後世師。

我們看重孔子，尊孔子爲至聖先師，但我們絕不能說孔子是一位現代西方所謂的教育家，因爲孔子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傳授知識技能只是其一小部份。他被尊爲至聖先師是指廣義的教育而言。再就通俗言之，如三國時代的諸葛亮與關羽，以狹義的教育觀念來看，此兩人都與教育扯不上關係，但一個代表忠，一個代表義，自三國以來，此兩人在中國社會教育上有極大的貢獻。如果誇大其詞，我們亦可說諸葛亮與關羽對社會教育的貢獻，其地位亦至高無倫。西方人看重事業，事業要論成敗，而中國人每不以成敗論人，此因爲中國文化傳統中看重人物的品格表現。看重人物，就得要論品德。若僅以事業論，諸葛亮關羽都是失敗者，不足重視，若以人品論，則一代表忠，一代表義，都足以爲後世法爲百世師。我們要研究中國教育史絕不容忽視此一以往文化傳統及其歷史記載之特性。

中國近代受西方文化影響，視教育成一專門的學問，但這只是近百年來的現象。如果說，教育應包括品格修養與學識充實兩部份，在西方教育傳統中，則是將兩者各別分開實施，品格教育屬宗教方面，智識技能屬學校教育。但在中國教育傳統中，視品格教育與智識技能爲教育的一整體，或可說，更看重品格教育在智識技能之上。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爲後知識的，此就小學階段言。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成了先知知識後行爲，此是指大學階段而言。可見知識行爲乃是一

體，只在教育階段的過程中有先後之分。東西雙方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演變出兩種不同的人生。亦可說，演變出兩種不同的歷史形態與社會形態，而反應到教育的一應措施上，亦自有不同。

亦可說，西方文化傳統中，有宗教、法律、教育三項之分別，宗教救人靈魂與人安慰，在人生的某一方面是有其教導功能的，法律則在某幾方面禁止人做壞事，教育重在傳授人知識技能，教人謀生的本領，此三者各別有其用途。但中國文化傳統中，教育功能則已包括了西方人宗教、法律之兩項，此因中國教育精神看重人的品格修養，講德性，重做人的道理，取代了宗教地位。德性表現在行為上，人人有好的行為表現，自可人人守法不做壞事。所以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自創的宗教，法律亦比較不受重視，而教育一項，其受重視之地位，則又高過了西方。兩種文化背景不同，其歷史發展的路向自然也不相同，因此我們絕不能以西方人的眼光，來從事研究中國教育史，這點是首當注意的。

二

中國歷史的演進，並非沒有變動，但其變動不如西洋史之可以截然劃分。中國歷史上，雖亦不斷有朝代更迭，有盛有衰，有治有亂，而其文化精神則依然一線相承，惟有在和平狀態下轉移改進，易使人忽略其中所有之變化。中國歷史上有封建制度，乃是先秦以前的一種政治體制，此與西方史上中古時期之所謂封建社會有不同。西方中古時期並無統一的政治，此後現代國家興起，政治亦未曾統一。中國在封建時代已有一統一王朝，今可稱之為封建的統一。自秦代乃變為一種郡縣的統一，而封建政體才告結束。大體言之，自秦以後，已無貴族世襲的政治，社會上亦不再是貴族平民顯然劃分的兩階層，而逐漸形成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秦始皇雖被稱為中國歷史上之暴君，但其最受詬病的焚書事件，卻為主張廢

封建而引起，此在歷史上有明證。今人治教育史，有將自秦至清，二千年來稱之曰半封建時代之教育，可謂昧於史實。

先秦以前，封建時代最高教育的對象，乃爲貴族階層，教育內容主要也限於貴族日常生活所需之種種，此爲不諍之事實，但自漢武帝以後，國家成立太學，立五經博士，太學生選自民間俊秀及地方低級小吏。太學中所教五經，在封建時期雖屬王官之學，但至此，則五經乃以教平民，而尊爲一般政治措施方面之最高領導。自武帝成立國立太學，可說政府將政權從貴族階級之手正式公開轉移給平民社會高級知識份子之手，故自此以下之政府當稱之爲士人政府。至唐，有科舉考試制，許人民自由報考，可謂政權之更澈底開放。如強稱自秦以下的中國爲半封建時期，誠不知將此史實作如何解釋。

有說中國兩千年來是一專制政治，科舉取士的制度爲便於中央集權的統治，爲牢籠天下人心的一手段，平民一旦被錄取，卽變爲統治階級，而供君主之驅策。又說考試制度使平民有由其一躍而升入統治階級的希望，遂養成馴服被治的民族性，而不願起來革命。此又爲昧於史實之言。漢武帝以五經爲士人求學之目標，主通經致用，講經重微言大意，以求領導政治之實際應用。惟當時讀書人究屬社會中之少數，解經重家法師說，讀書人不普遍，不免形成讀書入仕爲少數人之特權，遂演變成東漢以後的門第，此乃爲當時歷史上的時代環境所限止，絕非當時上層政治所能急切轉變。至唐代有科舉制，許士人自由報名，門第勢力始能因此逐漸消失，而平民與士人間之流轉亦加速。下至宋代，社會再不受門第影響，而又因印刷術之發明，書籍流通較前大爲便利，讀書再不是少數人的特權，布衣卿相已成當時一極普通之現象，平民與士子間之流轉更快速，宰相之子弟，依然當依科舉進升，如不努力考試，三四代後，仍得從政治圈中退出，成爲一平民。

有了國家，便該有政府組織，來管理國家之事。而此政府中人，由平民中公平競爭，自由升起，是一種極合理的現象。不能因有了此一政府，即認為此國家乃有統治與被統治特定的兩階層之劃分，而視此為一不合理的制度。如此，則除非將國家之政治組織徹底取消不可。一個國家管理衆人之事的一羣人，既屬不斷地起自民間，瞭解民隱，此即可稱為是一種開明的政治，又何需起而革命。而且中國是一個廣土衆民統一的大國家，一旦引起革命，勢必長期動亂不易恢復。因此在中國，社會革命必然會弊多於利。中國政府長期實行考試制度，意即在此。而敘述中國教育思想勢必牽涉到政府上層的考試制度，由此也可瞭解中國教育在過去傳統文化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又有人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而謂儒家思想為封建時代之產物，建基於農村經濟，雖有功於維持農村社會之安定，但尊君抑民便利於帝王專制政治對其人民的統治與駕馭，而認為漢武帝之罷黜百家，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為最佳之明證。此又為有背於史實之批評。先秦諸子中，以儒家思想最標榜人文精神，儒家對於整個人生做人處事抱有一崇高理想，因此對於人生各方面的活動，包括政治活動在內，都有一理想標準，而教導人終身向此標準努力以赴，改造現實以達成理想，此為其他諸家所不及。故凡對政治抱有理想的人，莫不主看重儒家思想，此為情理所趨，亦無可厚非。

三

要研究中國教育史，首先應瞭解中國傳統教育中的精神與理想，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流。儒家思想中教育的主要意義在教人如何做人，並不專為傳授知識技能。其教育對象乃為全人類之全人生，每一人自幼兒以至老年，包括了整個人生過程。故儒家教育宗旨重在「人羣」，而教育實施則重在

「小己」。既非今日所謂之大衆主義，亦非今日所謂的個人主義，主要在融個人於大衆，而各盡其可能之貢獻，其努力則在各人德性之自我修養，做理想中一社會人。故儒家教育思想乃是一種德性主義，建本於人的性情，務使其自動自發，而傳授知識技能居其次。理想人之最高標準在成爲一「聖人」，故在儒家思想中特標出一種人品觀。

中國人的人品觀中，主要有「君子」與「小人」之分，其分別則在各自的德性上，而不在社會中的職位上。做一皇帝有好皇帝壞皇帝之分，做官有清官貪官有盡職不盡職之分，做一農民或商人亦有守法不守法之分。今日社會複雜，職業變化多端，但無論那一行業中，人都有好壞之分，此好壞乃專從人的德性分。人人皆有一份好德性，皆可完成爲一好人，其事則需有賴於教育的講明與指導。此因人性本於天賦，人性相同，只要明性盡性，人人自可達到其最高可能之境界，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是平等的，亦是自由的。果使社會中人人都成堯舜，則現實的社會也就是人生的天堂了，此亦即是儒家教育的最終目標。

近代西方人崇尚自由平等，但只從外面看，便成爲人人不平等，處處不自由。西風東漸，中國的一輩知識份子乃認爲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不講自由平等爲一大病害，此實未深切瞭解儒家思想。人人生而有智愚貧富等的不平等，長大進入社會又有機緣命運等的限止，不可能人人在社會上求得職業財富地位的平等，於是因於外面的不平等而引起了種種爭端，遂更使人感有不自由。儒家思想重在各自追尋德性上的平等與自由，其事在向內求，不在向外爭，求之己則得，爭於外則失。人生亦惟有求得德性上的平等與自由，才是人生的眞平等眞自由。如不能明白此中眞意，盲目向外面去爭取，眞性日漓，自我全失，尙何平等自由可言。

西方人提倡向外爭取自由平等，其實所爭有限，若人人儘自向外爭取，你的自由必將妨害了他人的自由，因此在人生現實生活中，個人行為只能有有限度的自由，不可能有無限度的自由，惟其在德性修養上，乃可使人人獲得其充分無限之自由，不僅不互相妨害，而更見其互相融洽。儒家所謂盡性成德，乃是人生一最高最大的自由，而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來達成社會中人人所嚮往愛好的真平等。既此便是儒家的教育理想與精神。

四

中國文化傳統精神看重道的傳授，師即所以傳道，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尊師意義即在此。所以中國傳統教育理想最重師道。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大聖人孔子，即是一大教育家，正為孔子乃為中國社會首唱師道者，換言之，中國傳統的教育理想由他奠定，所以後人尊其為「至聖先師」。孔子是一師，同時又是一聖人，中國文化理想中的聖，同時便該是一師，而為師者，在理想上也該學為聖，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最著精神之點，而正好以孔子為代表。孟子說：「聖人百世之師也」。又說：「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這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重在求人品之完整，而教育的意義也主要在品格德性的培養。如果教育只看重知識技能的傳授，孔子亦不能為百世師了。

中國社會傳統觀念以「天、地、君、親、師」五者並重。天地是一宇宙自然，由自然產生出人類，人類不斷的演進而有了人文教化。在中國的文化系統中，有三大統並受重視，一曰「血統」，屬家庭倫理，凡子女必應孝父母，子孫必祭其祖先。二曰「政統」，屬政治羣體，主尊君，即所以重政統。三曰「道統」，或稱學統，屬文化理想人生大道，尊師即所以重道。無天地與親，則無人類。無君，則雖有

人類而無羣體組織，如此則人類只得在此天地自然中聽任其各別的自生自滅。此一尊君觀念，最爲近世受西方文化影響者所反對。古人云：「君者羣也，不得羣心，則爲獨夫。」故君亦有君道，得道之君固當尊。應知政統正爲人類進化的產物，是不容否定的。無師，人道無以顯無以成。此三統乃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所寄，而中國文化傳統之得以一脈相承數千年來傳遞不絕實有賴於此。

此三統之中，尤以道統更在其他兩統之上。道指人生文化的理想而言，包括了人與人之間一切交往，也即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羣間的各種倫理關係而言。所以「尊師重道」，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特有精神，而中國社會亦賴師道爲中心而維繫。中國社會中此一尊師傳統之特殊意義，爲並世其他民族文化中所無，而卓然成爲中國文化精神獨出之所在。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一尊師重道之傳統，豈不值得我們今日再反省，再警惕。

君主政統，師主道統。從過往的歷史演變中看，政統數百年必變，而道統則與民族文化而並存，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毋寧是道統更重於政統。因此中國歷史上歷代帝王主政統者，亦必知尊道統，此又爲中國傳統文化中另一特有精神。在此一特有精神下，自古以來王子貴胄必受教育，而以王太子爲尤然。漢高祖起自平民，史稱其見人戴儒冠必取而溲溺之，卽其爲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高祖以下自惠文景武起諸帝爲太子時，皆必拜師受教。文帝時，賈誼上陳政事疏，特提出太子必受教育的理論，曾云：「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云：「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在君主政體之下，主張太子早受教育，也應可稱爲一極端開明的主張。下至東漢，光武帝在軍中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卽位後，史稱其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是光武以一開國天子而勤劬如一書生，實爲歷代所少有。光武以下明章爲太子時，敬師崇教，亦儼然一如書生家庭

之子弟。東漢皇室世傳書香之習，直至順帝時，尙有餘風。史載章帝師張酺，後出爲東郡太守，章帝東巡泰山，過東郡，張酺謁見。章帝先備師弟子禮，令酺講尙書一篇，酺上坐，帝下坐聽講。然後再修君臣之禮，帝上坐，酺下坐白事。此在中國歷史上，永傳爲帝王尊師的一段佳話。此卽所謂道統尊於政統之一明白例證。

至宋代，不僅皇太子需延師受教，政府更有經筵講官之設，爲皇帝師，皇帝亦得定期聽講。神宗時，王安石爲講官，爭天子立聽，講官坐講。曾謂：講官所講者道，天子尊道，則當立而聽，講官坐講，非以自尊，乃尊道。其後程伊川以一社會白衣進爲哲宗侍講，亦爭坐講之禮。他曾說：「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其後明清兩代，皆有經筵講官之設，而歷史上教育東官太子的制度，更值得注意。

古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經師重知識傳授，人師重行道踐履。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一向看重所言必能所行，故教育重在能以身作則之人師，更在講授書本知識的經師之上。中國傳統社會一向所期望於師者，無論是幼學啓蒙之師，乃至講學論道之師，要之，師之爲業，必當明道作人。換言之，理論實踐合而爲一，身爲師者，得有志擔負起人生中最偉大崇高之職務。

唐代韓愈曾作師說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此三項實已包括盡了爲師之全部任務。道指人生理想與做人標準，業則可包括學業與事業，人生各應經過一番學問，再把其學問所得來貢獻於社會，卽是事業，此二業仍只是一業，上自爲君下至社會中各行各業都可包括盡。人類歷史不斷演變，社會情況日益複雜，人之才性各異，而所遭遇又是千差萬變，則不免時有所惑而需人指引。照此說來，韓愈所說之師道至高，何人能盡得此師職呢？豈不成虛懸之說！孟子曾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孔子

雖爲後世尊爲至聖先師，但他只自許爲能學不厭而教不倦而已。因自人道論絕對需有師，而師道難盡，故在孔子也只是一面教，一面學，古人說教學相長，其意在此。

但師道也可從另一面解說，因師道雖如此博大高深，但從人生切近處講，師道只在教人如何好好地做一人，教人在其自身所屬之各行各業中，各盡一己之責而已。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爲人處世之道一言而盡。孔子又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孟子亦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可見人人可以爲人師，人人亦可以自得師，由此人人自能懂得推己及人，懂得如何去引導人啓發人，教人去做一好人一善人。如此說來，師道卻又是人人皆能，人人可有，但此亦需有一個起碼條件，即是人人先要抱有肯爲之心。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此一肯爲之心的起碼條件，推極言之，亦可謂即是爲師之道之最高目標了。

近百年來中國社會在西方文化的極度震撼中，首先對自己民族文化傳統喪失了信心，進而懷疑中國以往歷史文化中是否真有此一套道統，又是否值得保留與發揚，至使師道淪喪。此百年來教育制度的逐步西化，智識技能的傳授遂成爲教育中惟一目標，德育退於不重要地位。教育意義與理想的大前提已變，則所謂師道之內涵意義，自亦隨之而變。今日之教師則僅成爲一純職業性之自謀生活的職位，父母寄望於師者，只在如何教導其子女使能升入高級學校，以及獲得一學校文憑，以爲子女他日步入社會之謀生工具，卻並不連帶重視到學校之教師本身。社會亦只以百業之一業來衡量教師之地位。今日社會之普遍現象，視學校教育爲一職業預備所，一知識販賣場，在此一風氣之下，而希望學校教育作育出之人才真能爲國家民族以及天下之用，豈不成一空想。

要恢復民族自信自尊，必先復興文化，要復興文化，首先必應振興教育，要教育善盡其職，必當復

與師道。師道之尊，固然有賴於社會風氣的提倡，然爲師者，亦應各求自尊自重，互尊重。古人曰：「敬業樂羣。」爲師者，倘能人人敬此業，樂此羣，縱使社會不尊師，師道仍可以復興。教育本是一種精神事業，上承往世，下啓後代，不僅青年們的前途操在教師們的手中，國家民族的前途亦有賴一輩教師的善盡職守。對教育事業抱信心，對青年前途抱熱忱，對國家民族命運抱關切，爲師者，能懷有此種崇高的情感，自會激發出其深切的責任感。而在其盡責的過程中，自能獲得一種快樂與滿足，此種快樂與滿足，則決非金錢物質以及權勢地位所能換取，而尤其是教師自身人格的提高，更是一種無價的收穫了。

五

由於中國文化傳統有其獨有的特性，因此要瞭解中國以往教育的演變，不僅要看重學校教育及國家考試制度之兩項，其更主要者，在注意中國歷史上學術思想之演變而歸宗於孔子儒家之所以然，如是始可接觸到學校教育及考試兩項制度背後演進變遷之意義所在，而此一學術思想之演變又與其各時代之歷史背景相配合。試舉例言之，如繼先秦列國紛爭百家競起之後，秦漢一統，社會學術風氣亦隨而變，故講學尙同亦勝於求異。漢武帝表章五經，其主要意義在根據歷史演變來領導時代新運，故其時治經學者亦貴在講求五經中之大意微言，以通經而致用，即本經術以領導政治，成爲其時學者一更重大的目的，因而國家教育才應運而起。五代爲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社會無學術無人才，至宋而人才蔚起，學術思想煥然一新，意在復兩漢經學之光昌。不幸自慶歷熙寧先後兩次變法失敗，學術路向才自注重上層政治一轉而偏重下層社會。先重個人修身，而後乃始及於治平大道。於是下層社會私家講學之風漸盛，